

## 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规划

北京大学哲学系 赵敦华

哈贝马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长起来的德国哲学家。他从学生时代起便正视德意志民族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命运和责任，并对德国民族精神、文化与哲学进行严肃思考。他曾经这样谈到法西斯主义暴行在他心灵上引起的震撼：“十五六岁时，我坐在收音机前听纽伦堡审判的现场讨论。当其他人对大恐怖沉默，却在争论审判的公正性、程序问题和司法问题时，就已经有了第一次决裂，这一分歧依然存在。”之所以有分歧是因为，并非所有的德国思想家都严肃认真地思考德国的过去和现在。相反，战后除了雅斯贝尔斯等少数人外，大多数人或保持沉默，或采取回避态度，或做翻案文章。当德国再次成为欧洲强国之后，“协调过去”成为舆论界焦点。一些历史学家公开为纳粹德国开脱罪责，例如，斯图姆尔（M.Sturmer）呼吁历史学家为过去提供一个正面形象，赫尔格鲁伯（A.Hilgruber）在1986年出版的《两种毁灭》一书中称颂德国军队抵抗苏联红军的“历史功绩”。

引起哈贝马斯关注的另一严重问题是新保守主义对左派知识分子和左倾文化的全盘否定。1968年学生抗议运动失败之后，少数极端分子开展恐怖活动。德国学生恐怖组织“红色旅”激起朝野一致反对。新保守主义势力乘机把恐怖主义的根源归咎于20世纪60年代左派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知识分子被指控为操纵文化形势的“新阶级”。美国新右派代表人物斯藤费尔斯（P.Steinfels）在1979年出版的《新保守主义者》一书中深恶痛绝地说：“新阶级和他们的敌意文化必须被驯服，或从一切敏感领域清除出去。”德国的新保守主义者号召重建“秩序的思想”。哈贝马斯指出，新保守主义的指控混淆了因果关系，恐怖活动的原因只能到造成社会分裂的政治经济因素中寻找，而不能归咎于先锋派艺术家和左派思想家的“新阶级”，“秩序的思想”的实质是调动历史上一切可被资本主义接受的思想，以平息现实中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的思想。

哈贝马斯对保守主义思潮作了三重区分：老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和青年保守主义。用他的话说，老保守主义者“要求回到前现代的生活方式”；新保守主义者接受“技术进步、资本主义的增长和线性化的管理”，但却“要求一种清除文化现代主义的暴露内容的政治”；而“青年保守主义者概括了美学现代主义的基本经验，展示了一个非中心的主体性，避免了理性认识和目标限制，也避免了劳动和实用的强制，并用这种方式突破了现代世界。他们因而通过现代主义的态度来建立一种不妥协的反现代主义……这一倾向使法国产生了福柯和德里达。尼采的精神在70年代重被唤醒，高悬在他们之上”。很明显，“青年保守主义”即后现代主义。问题是，新保守主义者是“新右派”，而后现代主义者大多是“新左派”，左右两派在何种意义上同属于保守主义阵营呢？

为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首先应该理解哈贝马斯对现代评论的看法。他承袭了韦伯的思想。韦伯认为，现代化就是社会文化领域的分化；在前现代社会，一切文化领域都服从于一个无所不包的“宇宙论世界观”的统摄，神话或宗教的文化形态支配着其他一切文化形态。启蒙运动以“独立的逻辑”的思维方式，开始了不同价值领域的“自我立法”的进程，分化出三个独立自主的价值领域：科学技术、道德法律和艺术。现代化是人的三大价值领域的制度化，职业化的科学、普遍的道德准则和自由的艺术创造是现代性的伟大成果。

哈贝马斯进一步指出，三大价值领域在现代化进程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体现在自然科学技术之中的“认知—工具”价值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工具理性的超常发展以牺牲道德、艺术的文化功能和价值为代价，其结果是经济势力和国家政权超越自身范围，侵入“生活世界”，哈贝马斯称

之为工具理性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然而，后现代主义站在现代艺术强调自由创作的浪漫主义的一隅，否定现代文化的全部。这种做法与工具理性侵入现代文化其他领域的偏颇属于同一模式，都用一个极端否定现代文化全部成果。后现代主义以“特殊化”的要求瓦解社会凝聚力，以“解构”的游戏精神取消普遍的价值观，以艺术和文本的“自由想象”动摇“生活世界”不可缺少的理性基础，以“反人道主义”的口号抹杀个人价值和人的尊严。他们言谈的后果必然为新保守主义所欢迎。哈贝马斯尖锐地指出：“对文化现代性的排拒和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崇拜巩固了一种普遍的反现代主义，要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泼出去。如果现代性除了赞扬新保守主义的辩护主义之外不能提供任何东西，人们便可理解为什么今天一部分年轻知识分子会通过德里达和海德格尔回到尼采，在青年保守主义不妥协的崇拜复生的怪异声音里寻求拯救。”在新保守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占主流的氛围里，哈贝马斯高扬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旗帜，力挽狂澜。后现代主义者称他为“最后一个伟大的理性主义者”，但很难超越这个最后的障碍。